

吴雨平 著

橘与枳

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

日本漢詩の文體學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雨平 著

橘与枳

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
日本漢詩の文體學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 / 吴雨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04 - 7662 - 7

I. 橘… II. 吴… III. 汉语—诗歌—文体—文学研
究—日本 IV. I31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1918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特约编辑 赵有长
责任校对 韩 聪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方汉文
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为六经之首，“诗正而葩”，中国的“诗”最初专指《诗经》，以后则推而广之，作为一种文体，泛指押韵有节奏的吟咏之作，自古至今而然。

情动于中，物感于外，在心为志，出言为诗，或以言志，或以明道，古今东西之诗，皆如是焉。故世界各民族之文学皆以诗始，中国之《诗经》，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巴比伦之《吉尔伽美什》、古代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色列人的《雅歌》，都是世之瑰宝。如果以诗体而论，则中国汉语诗源远流长，与英诗并为诗界之宗主，这也是得到公认的。但并非人人都知道，汉诗不仅中国有，日本的汉诗也是一绝，不仅因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引人注目，而且以其多姿多彩的风格、通变与民族精神的显现等特征而自成体系，人称“日本汉诗”，自清末学者俞樾编《东瀛诗选》以来，蔚然成为诗学一大宗，近年来又成为世界诗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之重要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

吴雨平副教授授业之余，勤勉问学，并两次远渡东瀛，问学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等院校，搜剔爬离，历时三载，博士论文杀

青，越二年，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征序于余，余何让之哉！

博士论文乃学位论文之最高规格，其要求自非寻常。然当下文风涣漫萎靡，“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吴雨平的博士论文却“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力图展现学术公器之神圣精神。

学位论文之选题与角度至关重要，要能在学术史上有创新意义，又要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科学求实精神与学术创新缺一不可，此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体”也。以此论之，吴雨平博士论文的创新性是值得肯定的，日本汉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尤其是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文体（广义的文体概念）上以考察其通变，远有汉诗格律流变可为借鉴，近有当代语言学文体与言辞美学（从索绪尔直到巴赫金“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言辞创造美学》）作为论据，可谓左右逢源。吴雨平博士对文体学的理论传统注入了自己的理解，首先把文体的对象扩展到言语运用的形式和内容各个方面，突破了刻板的修辞模式，其次是将文体植入文学与精神圈的环境中，考察二者之间的回环与互动关系，刷新了汉诗研究拘泥于语文学的传统。

选题角度决定了视域，但是作为现代博士论文，只有专深的角度与视域仍是不行的，笔者阅看了20世纪英美大学的博士论文，发现50年间视域变化极大，传统的大题目现在几乎见不到，代之而起的是相当深邃的专题研究。欧洲大学学科教育起步早，其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视域之后即是材料，这也是国内当前博士论文的一个弱项，一是材料陈旧，外文资料中看不到21世纪新成果。另一个特点是材料不系统，东鳞西爪，不能穷尽本专题的主要著作。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博士论文，无新材料即无新学问，近年来我指导的

博士生大多是高校副教授与讲师，我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掌握原文资料与理论方法，其中尤其重视原文资料，还是顾炎武的那句话，要采之于山不要买之于市。吴雨平的博士论文是建立在其在日本辛勤采撷查找大量汉诗原文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行文之中既有文本，又有史证，还有历代评鹭，应当说比较全面，特别要强调的是，其征引足以反映中日两国关于日本汉诗研究的最新主要成果，虽然这个领域仍然是新的，但是肯定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是必要的，这也是论文成功的前提。

2006年，余在台湾某大学讲演中，有听众提问曰：学分古今中西，术有考据义理辞章之别，我们拜读了先生流传在台湾的几本书，发现涉猎相当广，不知先生及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侧重点是什么？主要研究方法是什么？

余当时在电脑书写板上写下四字作为回答：

本古执今。

学术之古今中西都是后人的分法，其实并非自来就有。何时为古，何时为今？孔子不征殷周而不知夏，鲁宅壁中书不出则不知古文，赵宋前不知金石，1900年卜辞不出则不知三代，20世纪70年代简帛不出则不知战国，没有今，何有古？没有古，又何来今？

学术之古今，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也。学问之中西，肝胆楚越也。古今中西之学不可断然分，近人论“国学”者甚众，其实古不知甲骨文、金文、石刻与简帛之学，近不知梵泰二西之学，亦奚以为“国学”耶？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以古代学术为本，执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之，以中国学术为本，执二西之学（即古代西方印度与现代西方之欧美）以为援，此之谓“本古执今”也。余本人以中国古代与西方学术的义理为私好，主张古今中西的贯通，“通一经者不能专断”也，前人所谓“知古不知

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实为至理名言。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与博士生论文选古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为题的相当多,这是余所赞同的。

资料是博士论文的基石,如果没有充实的资料,观念的建立总是显得苍白。从我国的学术史来看,自明清以降,江南学者重视实证考据之学,形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如果博士论文能够继承这一学风并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发扬创新,我想应当是其正确的发展方向。略需说解的是,这里并非贬低理论或是辞章,只是希冀这种言之有据的学风能够得到推广,理论与辞章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论文的灵魂,但是,言之无物却有使文与理跌入空泛的危险。

至于说到论文的创见与方法的应用,近年来余其实多次强调。现在有一种相当错误的看法,认为创见就是一句别出心裁的话,特别是那些任意否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哗众取宠之论,甚至夸夸其谈的“鄙倍之辞”,更容易得到一些人的青睐。其实这是相当危险的,首先任何创见都必须是言之有据,无坚实论据与论证过程的空话无异于信口雌黄,博士论文坚决不能有这种言论出现。从吴雨平博士的论文来看,这种平实而具有创造性见解的意义就十分突出了,论文的结论来自于确切的考证与论证,言之成理,这是应当推广的长处。

论文中最难的其实是“论”字,自汉魏以来,“不能持论”已然成为文坛之患,先秦诸子的雄辩常令后人汗颜。博士论文更要重视论证过程,这也是吴雨平博士论文的一个长处,以论证的逻辑力量来征服听众,远胜过激烈的文辞与空虚的玄想。任何形而上学的思考必须顺从理论思维的规律,这是学位论文的一般准则,而不是个别人的倾向。

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有长达一千余年文学文化交流关系,有共

同的文字渊源，近现代以后，则演化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形态，中日之间的这种文学联系世所罕见，弥足珍贵。“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近年来，日本汉籍的整理相当活跃，余上文已经指出，理论的阐发以及文献与资料的发现必将孕育新的突破，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在经历种种误读错解之后，必将有新的拓展与涌现，我希望吴雨平博士与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其他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们能够不负时代，劲发新声。

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晚

写于沪上牧鱼楼寓所

目 录

序	(1)
绪 论 “文体学”对于日本汉诗研究的意义	(1)
一 “文体”与日本汉诗	(2)
二 日本汉诗的研究史述略	(9)
三 本书的研究进路	(14)
第一章 日本汉诗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	(19)
一 日本汉文学和日本汉诗的涵义	(19)
二 日本汉诗的起源	(23)
三 日本汉诗的历史分期	(27)
第二章 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	(37)
一 传情达意的汉字:日本汉诗的物质载体	(39)
二 儒禅合流的诗神:日本汉诗的思想体系	(51)
三 诗的道:汉诗是古代日本与东亚诸国文化交流 的纽带	(63)

2 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

第三章 日本汉诗与执政者的意识形态	(77)
一 天皇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对早期日本汉诗 的支配地位	(78)
二 幕府的执政思想与五山汉诗的复杂关系	(92)
三 儒者的文学观与江户汉诗大盛	(102)
第四章 日本汉诗与其创作主体	(111)
一 早期汉诗:公卿贵族独占诗坛	(112)
二 五山汉诗:寺院僧侣一统天下	(123)
三 江户汉诗:儒者阶层纵横四方	(132)
第五章 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选本、诗文别集	(144)
一 《文选》	(145)
二 《白氏文集》	(150)
三 《三体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	(157)
四 《唐诗选》	(164)
第六章 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170)
一 “传播研究”及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 选择原理	(170)
二 日本汉诗的文体格律与中国古典诗歌	(179)
三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与中国诗歌传统	(189)
四 日本汉诗从“公”到“私”的演变历程	(198)
第七章 汉诗文与《万叶集》	(205)
一 《万叶集》诞生的中国文化背景	(206)
二 万叶和歌在内容上和汉诗文的关联	(209)

三 《万叶集》的民族特色	(213)
结语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40)

绪 论

“文体学”对于日本汉诗研究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在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影响下，文体学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之一，并且波及古代文学批评以及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

本书就是以文体学的视角进行日本汉诗研究的一次尝试。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本书所研究的“日本汉诗”是指日本人用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进行创作的诗歌，它们具备中国格律诗的形式，并且往往借用中国的人物和事物典故。然而，与中国古典诗歌同宗同源的日本汉诗，在日本的国土上，已经逐步地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正所谓“性质相近，同源异流”，究其原因，正如《晏子春秋》中那段著名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虽不是根本的，但也是十分重大的。《淮南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西汉淮南王刘安等撰，公元前2世纪）说的是橘子生长在南方时，甘甜可口，令人喜爱；而到了北方，就长成了苦涩的枳，让人难以下咽。这两段话原本都是用来比喻生长环境对物种的影响作用的，然而“南橘北枳”之说却正好契合我们的论域。

日本汉诗是跨民族、国家与文化的迁徙与移植，是中国传统诗歌与日本文化共生激荡的新“物种”。本书的主旨，是描述汉诗如何在日本的文化环境和诗人的写作活动中发生其文体模式的多样性流变的过程。

笔者认为，文化环境的选择性在汉诗的演化史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成为汉诗的日本基色，使汉诗最终适应了日本的文学场域。当然，日本的文化环境也非静止同质的，相反，它是一个宏大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不同的辗转变迁。本书的研究，不仅描述了汉诗由中国迁徙至日本与东亚的一般过程和性质，更加精细的工作是研究了汉诗在日本政治、意识形态等文化史中的风云际遇以及随体赋形的流变。

本书尝试将日本汉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对其“生命史”进行文体“演化”的研究，考察日本汉诗诗体、诗风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并且同时关注这种过程与作为文体环境的日本社会历史进程中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以及日本各个历史阶段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势力的消长对日本汉诗的作用，即通过对日本汉诗这种特殊文体的内部和外部研究，来探究它尚未被完全挖掘的历史文化及文学价值。

一 “文体”与日本汉诗

“文体”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一词的含义非常广泛，它至少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三个方面。“体裁”也称为“体制”、“体格”、“大要”等，它是在对文章的类别特征进行界定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某一种体裁的创作者都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共同遵守的“文体规范”，它包括功用宗旨、创作原则、篇章体制、题材选择和风格特征等丰富的内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了“往岁人士尚对偶为文”以及“穆修、张景辈时为平文”后说：“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沈括所说的“对偶”（文）与“平文”指的就是骈文和散文，他说的“文体”则是指体裁或曰文学类型。然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更多地是指“风格”，如唐代僧人皎然在其诗论专著《诗式》中就用“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19个字来概括诗体，这19个字实际上说的都是诗的风格体貌特征；《文心雕龙》在《风骨》、《定势》、《章句》、《序志》等篇章中多次提到的“文体”也大多指风格，只是到了后来，这部分的内容更多地被“品”和“格”所代替，文体研究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专门的学问。因此，中国古代“文体”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它对应的含义确定的词语，所以西方学者曾经指出：

“体”这个词，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但是，这个中文术语体现了某种区分，因而也就体现了某种关注，这是与之大体相当的那个英语术语所没有的。在中国文学思想传统中，“体”指规范性风格（normative style），也指类型规范（generic norm），以及规范形式（normative form）的其他方面，它不同于一种规范（norm）在某一文本中的具体落实层面，（也就是说，风格意义上的“体”始终指一种标准风格类型，

而非某一文本的具体风格)。^①

宇文所安虽然没能给“文体”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古代“文体”的指涉范围为“风格”、“文类”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三个方面，同时指出了它的内在含义是一种“标准风格类型”，也就是说某一类作品的风格，而不是某一部（个）作品的风格，这对于我们理解“文体”概念并且运用文体理论进行日本汉诗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启发作用。汉语思维以模糊著称，“体”既可表示文学文本个体或者群落的区别性特征，又可以暗示文本的浑一统合性，在更扩大的视界中还喻示了文体与文学史乃至整个精神圈氤氲郁结、错综互动的关系。因此，日本汉诗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而呈现出的独特的“风格类型”，正是它与日本的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民族文学样式最根本的区别，汉诗的历史也应该在日本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历史辗转中进行解读。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虽然非常复杂和丰富，但后来演变为主要是指文章的类别、体式，这实际上是西方文论中的“文类”或“体裁”的概念。西方“文体”（style）的概念一般认为源于拉丁语的 *stylus*，原意为刻字的刀或写字的铁笔，转喻为写字、写文章的手段和方法，进而引申为所写成的文章的风格特征，也就是修辞学、文章学、文体学所说的“文体”。西方关于文体的研究，即文体学（stylistics）源于古希腊的修辞学，主要指文章和文学的语言风格和语体特征，也就是说，西方文体学着重研究语言形式对于文学风格的意义，“文体”的含义要比一

① [美]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王柏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 页。

般意义上的“体裁”深广得多。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因具有“理式”的意义，是事物如其所是的依据与渊源，从这个意思上说，中西关于文体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由于形而上学的片面发展，二元对立的模式日益盛行，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在西方的一意孤行，“形式”便蜕变为抽离内容的躯壳，西方近代文体学的出现，是文学理论向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也与中国传统文体学有了很大的差别：

一般说来，只要涉及作品的主题意义或审美效果，文学文体分析就会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最基本的层次为语言特征；第二个层次为语言特征所产生的心理效果；第三个层次则是语言特征以心理效果为桥梁在特定上下文中产生的主题意义或美学效果。^①

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国内学术界，童庆炳先生已经指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中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②。他认为对“文体”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③。这种概括已经超越了传统文体学规定的对文学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文体分类的研究范畴，把文学文体研究引向了更新更高的层次，体现了文体学向语境研究的转向。

①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②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③ 同上。

本书对日本汉诗进行的“文体”和“文体意识”的研究，兼顾了古今中外的“文体”概念，即在中国传统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文体学”概念，认为“文体”既是语言的编码方式、体裁文类，更是文体风格、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乃至作家的主体精神，甚至是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的凝聚。这可以看做是本书对日本汉诗进行文体和文体意识研究的理论预设。

文体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正如王蒙所说：“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的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文体使文学与非文学得以区分。正像一个人的仪表对于人并非无关紧要一样，文体对于文学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①然而，过去我们文体学的“传统”似乎更倾向于把文体看做文学的外部形式，是用来盛内容的“器具”，因此，过去对于汉诗的研究往往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忽视了汉诗与中国及日本文化互相渗透和生发的关系。而文学理论的进展，总是以缓慢的速度进入分期或者分体研究者的视野。实际上，20世纪已经有许多学者洞察了文学形式与内容的有机性。首先，生活世界的经验与体验如欲转换为文学的“内容”，就必须挤进其形式的“格栅”，卢卡奇说过：“一切属于人、人的关系的东西都是内在的，只有当它在这一艺术门类的特定形式中产生感性的纯粹外在形式的效果时，才能成为审美的存在。”^②诚哉此言。其次，汉诗对于日本文学尤其是书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断不可以“器物”视之，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论，“艺术形式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艺术的自身世界，不论在主观

① 王蒙：《〈文体学丛书〉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匈牙利]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